

访谈

盖思德
余浩风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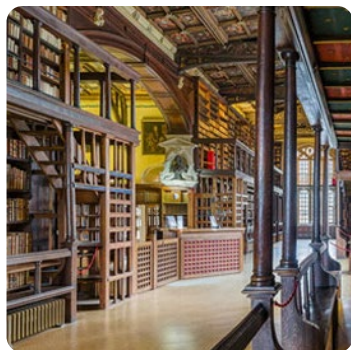
第2卷 第2期
2024年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自由国家如何 在中国促进民主？



盖思德



余浩风

编按：在当前全球格局中，民主自由国家如何在中国推行民主？这是一个重大且复杂的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余浩风有幸采访到前英国外交官和观察家盖思德（Roger Garside）先生，请他分享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自由民主国家如何为促进中国民主化发挥作用的见解。

盖思德先生是《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一书的作者。他对中国有长达65年的观察和研究，在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开始关注中国，见证了从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余浩风（以下简称余）：盖思德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允许我直奔主题：自由民主国家如何促进中国的自由民主？我们该从何处着手来探讨这个核心问题呢？

盖思德（以下简称盖）：首先，让我们简要审视一下全球背景。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在世界陷入了最为危险的境地。在今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民主的命运岌岌可危，我们正处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之中。而其斗争结果仍悬而未决。

自由民主国家及其公民的斗争对象是专制政权，而非中国或俄罗斯人民。我们对中俄人民没有敌意，我们希望与他们建立和平、互利的关系。有诸多证据表明，他们也有这样的愿望。然而，统治他们的政权阻止了这一切。

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来，他明确表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将致力于反对自由民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改变世界秩序。尽管他明确并强化了党追求这些目标，但这些并非由他首创。

自 1949 年中共强加给中国并一直维持至今的极权统治制度与自由民主格格不入。当中国还较羸弱时，它并未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直接威胁，但今非昔比，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它确实对国际秩序构成了重大威胁。

我们无法单方面决定中国的治理方式，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帮助那些希望将政治体制从专制变为民主的中国人实现这一目标。这方面的成败将决定民主与专制斗争的结果。

余：可是，75 年来，中共政权历经磨难，在困境中生存下来。许多读者会认为在中国进行系统的政治变革纯属天方夜谭，但您却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

盖：回顾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他们

认为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随后的历史走向彻底证明了他们的错误。显然，中国共产党希望我们相信，中国的政治历史已经画上句号。许多国际上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观点，但这和当年相信自由民主已经取得最终胜利的观念一样，是一个重大的误解。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寻自己的现代身份，这至今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我关注中国的65年里，每隔几年就会发生剧烈变化。政治体制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的民主运动期间几近崩溃。现在它再次面临危机。

如果自由民主国家及其公民要帮助那些想要改变的中国人，需要准确评估中国以及我们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余：尽管中国存在问题，但其实力不容小觑，您不这样认为吗？

盖：是的，我认为中国的确实力强大。习近平领导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军事力量。他的军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根据一些美国防务专家的说法，它可能已经在与台湾相关的事务上，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美国。习掌控着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内部安全系统。多年来，他致力于在国民中推广和灌输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习近平思想。他提出了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中国梦”，甚至动员了民族主义来支持政权。

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习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第三次连任党中央总书记，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的连任也开启了他终身执政的可能性，并且他能够用忠诚的追随者来填满最高领导层。习也在清洗军队、金融、

国防工业和外交事务中的高层领导。

与此同时，自由世界的领袖正被政治僵局所困扰。委婉地讲，到 2024 年结束时，可能会选出一位领导人，而很多人对这位领导人是否真心拥护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怀疑态度。

余：既然如此，在中国可以推行自由民主的想法，岂不是奢望？

盖：当然不是，远非如此。中国的实力只展现了局部情况，而很多看似**的强势实则隐藏了弱点**。表面上强大的中共政权其实内部脆弱不堪。除了其实力之外，如今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长期的问题和挑战，这些远非仅限于经济领域，尽管现在有关经济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了。早在 2012 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就指出中国存在道德危机。习近平也有同样的表述；民意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贫富差异巨大且日益增长：中国底层 50% 的人口仅获得了总收入的 15%，而在美国则是 12% 的人口，在法国为 22% 的人口。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恐惧和控制而不是信任的政治体系，扼杀了国民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还有地缘政治和环境问题，我们稍后可以进一步探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转向官方认可的五种宗教寻求生命的意义，而不是依赖于政党，对他们来说，政党并非宇宙中的终极权威。

这个政权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因为它们正是由中共强加的极权体制造成的，而这个体系正是中共控制整个中国所赖以生存的。

让我先来谈谈经济。

温家宝总理在 17 年前警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习近平担任中共领导 12 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习不仅没有使中国经济恢复健康，反而正将其领向一个逐步加深的经济危机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多年来一直在警告的债务问题正在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导致了地方政府资金危机，而且这个危机似乎看不到尽头。

地方政府收入的减少又加剧了另一个问题：它们对债务融资的过度依赖。据 IMF 指出，除了一些最富裕的省份外，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运营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所运营的现金流为负。

简单来说，这些地方政府靠的是庞氏骗局来维持运转，实际上是层层叠叠的庞氏骗局。甚至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还更糟。早在 2017 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史宗翰教授 (Victor Shih) 就在一份数据详实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的庞氏骗局”。他发现，在 2017 年，仅信贷利息就高达 17 万亿人民币，而新增的名义 GDP 却只有 7 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借出 2.5 美元，实际上 GDP 的增长仅为 1 美元。从那时起，情况变得更糟了。

长期以来，包括 IMF 在内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建议中国增加消费、减少投资，但这并没有发生。投资占中国 GDP 的惊人比例为 42%，而全球平均水平为 25%，债务与 GDP 的比率上升到了危险的 286%。但是投资都投向何处了呢？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投资大部分都流向了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但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变成了过剩产能和多余的基础设施，比如国内需求不足的钢铁、水泥，还有空无一人的机场和无人通行的道路。家庭方面，有

70% 的储蓄投资在房地产业上，而那些空荡荡的公寓楼所构成的鬼城，正是供过于求的直观证明。IMF 在其最近的一份报告中预测，未来十年中国新住房的需求将进一步下降 50%。这正在摧毁并将继续摧毁中国普通家庭的储蓄。

多年来，房地产开发商贡献了 GDP 的 30%。如今，他们实质上已经破产。在 2021 年房地产市场崩溃之前，他们从地方政府那里购买的土地为地方政府提供了 40% 的收入。而现在，在中国的许多地区，这一收入来源已经干涸。

持续下降的住房需求将使土地销售无法复苏，这将进一步加剧和延长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IMF 和其他机构担心这将对中国的整个金融系统构成风险。

余：中国政府难道就无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吗？

盖：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中国政府愿意私有化经济的关键领域，并通过把国家的收入更多地分配给普通家庭，来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根本性转变的话。但是，习近平不太可能采取这样的政策，因为这将动摇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本质上需要一场民主革命来实现。

余：我们来聊聊道德危机吧。习近平一上台，就发起了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反腐败运动，打击的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这难道不正中道德危机的要害吗？

盖：确实，腐败是道德危机的核心，但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原因。习的反腐行动只是在对付腐败的表象，而非根源，因为腐败的根源是体制性的。要有效地解决腐败，必须有自由的媒体和反对党来揭露腐败，有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机构来调查腐败，还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来判决和惩处腐败行为。在习的带领下，党对这一切都持反对态度，而习则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现行的政治体系。

所以，即使在掌权十二年后，习还在清洗高官，而且很多时候清洗的还是他自己任命的人。这就引出了一些问题：他的清洗行动真的是针对腐败，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个人的权威吗？

但问题远不止于此。在当今中国，腐败不仅仅是糟糕政府的副产品，它还是党维持权力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在 1989 年政治权威崩溃后，党故意利用腐败来驱使官员遵从其意志。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私有化运动就是这样设计的，这就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掠夺机会，通过允许官员和他们的亲信控制资产，而无需依法申报其所有权。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像裴敏欣教授在他 2006 年出版的《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一书中所述：“在中国各省，党委书记、地方官和警察局长与犯罪团伙勾结，从事走私、集体受贿和非法财产交易，形成了软硬兼施的黑手党国家。”“在这种‘分散的掠夺性国家’中，中国的地方官不仅免受民主的问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余：您刚说过，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恐惧和控制而不是信任的政治体系会扼杀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能稍微展开说说吗？

盖：稍后，如果我们讨论习近平的“中国梦”时，我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想说，中国的私营企业正在成功应用自由民主国家的基础研究成果，但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并没有领先世界。中国也没有在创造性艺术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余：在地缘政治方面，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通过贸易和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极大地加强了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盖：确实如此，但“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效参差不齐。它的项目执行受到了诸多问题的困扰，比如缺乏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经济、财务和社会影响的深入分析，以及财务条款的不透明，这导致一些受援国陷入难以承受的债务困境。

更重要的是，习领导下的中共采取的全球战略，致使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共的态度从原本的良性接触转变成不信任甚至敌对。

虽然中国是 120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且善于利用这一优势地位在国际政治（如在联合国）和经济领域胁迫其伙伴为其效力，但在 2023 年，经合组织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一致，近年来土耳其除外）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 GDP 的 40%，而中国仅占 20%。

当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一些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开始衰落。尽管欧盟从 2009 年到 2010 年代中后期经历了多年的债务危机，但美国在 2011 年就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且此后持续强劲增长。经合组织的主要经济体并没有经历任何生存危机。

虽然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构成了巨大威胁，并可能在太空领域逐渐赶上美国，但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它落后美国军事至少几十年。中国只与朝鲜有正式的军事联盟，而自由民主国家拥有全球性的联盟网络。习近平在俄罗斯灾难性的入侵乌克兰前夕对普京重申的“无上限的友谊”，并不是真正的力量来源。这种关系加深了中国与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间的敌意和不信任。而这些国家共同控制着全球最深最广的资本和商品市场、全球储备货币和银行系统。

余：说完经济，您能再简要地评价一下中国的环境情况吗？

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 2021 年发表了一份研究摘要，指出“中国的环境危机源于数十年的快速工业化，这不仅对中国 14 亿人民的健康和生计构成威胁，也对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构成了挑战。作为近年来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众所周知。此外，其碳密集型行业还引发了更多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紧缺和土壤污染。”报告还提到，“直到最近，中国才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的制定。在此之前，中国长期以来都拒绝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作出任何承诺。”也就是说，中国在应对这一严重问题上动作太晚。而且，即便到了现在，中国控制污染的措施依然力度不足。

这背后的原因是政治性的。党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成绩而非民主选举，因此，它长期将就业和经济增长放在优先位置，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等其他重要方面。只有当这种做法的灾难性后果在国内外都变得不可忽视时，中国才开始认真考虑环境政策。

余：您刚才提到，在第 20 次党代会上，习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史无前例的第三次连任党中央书记，开启了他终身执政的可能性，并且他能够用其最忠实的追随者来包装最高领导层。您在 2021 年的著作中半虚构的三位政变领导人都被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其中一人已经去世了。虽然您已经论证了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他个人对权力的控制无疑是非常强大的，是吗？

盖：在执政十二年后，习仍然需要清洗由他授权任命的高官。这表明，即使是现在，他也面临着反对的声音。他钦点的外交部长秦刚已被解职。为什么？没有给出原因，但有传言说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勾结。这使得习近平最信任的下属也有可能反对他挑战美国的战略。秦刚被解职九个月后仍未任命继任者。在我看来，这不像是实力的体现，而是在任命谁担任这一重要职位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同样，去年夏天，中国精锐的火箭军司令部高层领导全部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任何火箭军经验的人，这也不是实力的象征。试想一下，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人们会怎么说。

其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样化的国家，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安排忠实追随者并不是实力的象征。一个真正强大的领导者会包括不同观点的代表，自信地认为可以在自己的领导下将他们团结成一支团队。亚伯拉罕·林肯就是这样做的。事实上，他的内阁中包括了他最强烈的反对者。

余：但习近平牢牢掌控着统治的重要工具——内部安全系统，不是吗？

盖：中国内部的安全系统确实非常强大和广泛，而且仍然顺应习的意愿。但它依赖于相对数量较少的秘密警察，动员数百万公民线人监视那些被怀

疑不忠的人。如果告密者不再尊重和服从政权，那么无论设备多么先进，这一机构的力量都将烟消云散。这在 1989 年的东德已经发生过了。

当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时，尊重和服从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人们对政权的经济能力的信心正在减弱。几十年来，党和它统治的人民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契约：“我们让你赚钱，但作为交换，你让我们统治。”层出不穷的社会性事件和糟糕的政策正在破坏这一社会契约。

此外，“清零”政策所强加的限制让许多人感受到了政权对人身自由的侵入性。在 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爆发了所谓的“白纸革命”或“A4 革命”。身处自由民主国家大学校园里的中国大陆学生也加入了抗议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北京四通桥上展示的横幅将习近平称为“独裁国贼”，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对党的总书记进行如此的谴责是没有先例的。螺旋式上升的抗议导致习在宣布抗疫胜利三周后放弃了“清零”政策。这一决定是政治动荡而非经济政策决定的。

余：习难道不也控制着另一个重要的统治工具——军队吗？

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军队最近一系列清洗背后原因的看法。这些清洗真的是针对腐败吗，还是出于其他政治目的？受害者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参与军衔的买卖或者在国防采购中做手脚——这在军队和其他领域都是司空见惯的犯罪——还是因为他们反对习的军事战略，例如对台政策，或者甚至是像传言中的外交部长秦刚那样，反对他挑战美国的战略？我们这些外人不知道，但有证据表明共产党内部在地缘政治战略的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

余：习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所谓的“习近平思想体系”来实现中国梦，并将其强加于国家，以统一国家的每一个思想领域。对此您有什么评价吗？

盖：我们不应该被到处可见的习近平思想的机械复述所影响。在近 75 年的极权统治之下，中国人民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已经学会了表面上对党的意志唯唯诺诺，而内心却持有异议。从小学开始，父母就教会孩子如何表现出外在的顺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学会的欺骗技巧就越高明。这是他们进步和生存的代价。党的官员和他们统治的人民都在复述习的思想，但那些有智慧的人必然会对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这些感到不满。西蒙·莱斯曾将阅读共产主义文献比喻为“像咀嚼犀牛肉香肠”。尽管有审查机制的存在，社交媒体上仍然充斥着对习和政权的讽刺和嘲笑。

蔡霞教授在移居美国之前曾在中央党校教授政治意识形态长达十五年，她写道，有 60% 到 70% 的中高层党官认为宪政政府优于现行体制。他们比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面临的问题。他们属于拥有财产的阶层，他们把孩子送到自由民主国家接受教育，并在那里投资储蓄，有些人甚至自己也移民到那里。

在被罢免党领导人职务后，赵紫阳在其秘密日记《国家的囚徒》中说：“如果一个国家要现代化，不仅应该实施市场经济，还必须采用议会民主制作为其政治体系。否则，这个国家不会有健康现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的现代社会。”如果一位前党总书记二十年前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温家宝在十七年前就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轨迹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那么其他高层官员肯定早就预见到，如果中国不进行根本性变革，将会有灾难发生。

至于习的“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最高目标，哪一方面得到了真正的复兴呢？绘画、文学、音乐、电影、哲学还是历史研究？都没有。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停滞不前。确实有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和电影人涌现，但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在国外受到认可，在中国却被禁止。至于商业企业和创新精神，私营部门确实取得了一些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归功于市场力量被赋予的自由，而不是习近平思想或国家。科学和技术领域也是如此。

至于动员民族主义情绪来支持政权，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声望高涨时，这种做法是有效的，但近年来受到了重创。对新冠疫情的掩盖在国际上造成了广泛的信任和尊重损失，至少政治精英们对此非常清楚。习在普京对乌克兰失败的入侵之前宣布的“无上限的友谊”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害。

余：尽管如此，许多人说习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您不这么认为吗？

盖：确实，我非常不同意。与邓小平相比，习取得了什么成就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从贫穷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带入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行列。它产生了大约5亿人的有产阶层。它解放了中国人民的进取心和活力。当然，它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没有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但习的成就又有什么可以与邓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呢？

余：您已经描述了共产党政权的诸多问题和弱点，那么现在请您谈谈本次

访谈的主要问题：自由民主国家如何在中国推行民主？

盖：对这一问题的任何回答都必须考虑到自 1976 年毛泽东逝世以来我们试图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我必须先简明扼要地谈谈这个历史问题，并且撇开更广泛的全球背景不谈。

从本质上讲，自由民主国家与中共所期望的双边关系，这两者对彼此的期望值，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不兼容的：我们期望一个民主的中国，可以与们建立基于信任、互惠互利的关系，而中共则渴望一个可以重塑世界秩序的极权独裁体制。

长期以来，自由民主国家的许多人认为，与中国的接触能够逐步和平地实现他们的目标。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因为它没有正确理解中共的真实特性和终极目标。

接触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对中国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它并没有带来渐进的和平实现民主中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结束这种接触，正是因为它看到，如果继续保持接触，继续向市场经济过渡，那它的极权专制就会遭到破坏。中共遵循了卡尔·马克思的教导，即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作为一个极权党派，它将其政治垄断置于真正的“经济健康”之上。即使我们想要恢复我们过去三十年实践的接触，我们也做不到，因为中方不想要这种接触的关系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但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还不能对接触政策对中国的最终影响下定论。

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们无法通过渐进的、零散的改革实现民主中国。极权政权无法被改革，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那样，它们只能通过革命性变革来结束极权。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回顾一下历史。

自毛去世以来，自由民主国家所追求的“接触”战略，或中国人所认为的“改革开放”在三十年来对双方都有益。自由民主国家从流入中国的大量商品和投资以及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机会中获益匪浅。改革开放之所以适合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共认识到，要想继续统治中国，它必须做出战术性让步：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中国的控制；允许增加经济、社会和宗教的自由；建立法律机构和体系，越来越多地实行以法管制（有别于依法治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不同政见以及一定的言论自由和非政治集会自由；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外贸和投资，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原则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改善相关联，国会虽然可以随时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它却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克林顿自1992年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七项人权条件挂钩，但国会每年都会推翻这一政策。这部分是来自商业利益的压力，但也因为与中国日益密切的关系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使许多人相信，与中国的接触实际上正在或将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他们将党的战术性让步误认为是体制变革。中共尽力保持这种误解。它遵循了邓小平在1990年概括的“韬光养晦”战略，即鼓励相信政治变革并保持低调，以避免激怒美国及其盟友。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崇尚民主和法治的中国人利用已获得的有限自由来推动获得更多的自由，利用法律来抵御对人权的侵犯，并开始发展公民社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卡尔·波普尔、米尔顿·弗里德曼、以赛亚·柏林和艾恩·兰德。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作品的翻译需求很大。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军宁在 2000 年写道：“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特别关注产权、经济自由、宪政、法治和有限政府、个人主义、宽容、多元化和开放社会。”刘还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舆论引导者和各个领域的大多数‘名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作为左派的自豪感已被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自豪感所取代。”

但是，经济和社会改革未伴随政治改革所产生的问题迟早会显现出来。据报道，2004 年，被软禁的赵紫阳对一位探望他的朋友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最糟糕的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在其早期阶段也很糟糕，但它可以逐渐变得更加进步。但今天中国的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形式是无法变得更加进步的。”

因此，中国政治制度的极权主义特征随着这十年的进展而显现出来。出于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风险的担忧，党的领导于 2008 年结束了向市场的转型，并开始强化其社会和地缘政治战略。2012 年习近平上台后，他迅速加强了控制，减少了以前允许的自由领域。他奉行的战略是恢复党在所有生活领域的影响力，明确敌视包括自由民主在内的“普世价值”，并与自由民主国家对抗。韬光养晦已寿终正寝。

但我认为，中共在结束向市场的过渡和重新加强管控已经为时已晚。改革开放所创造的 5 亿有产阶级是无法被无视的。他们现在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已经尝过了自由的滋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机构和人权，并明白法律可以用来保护财产。在历史上，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也曾有过争取政治权力的愿望，他们同样也有这种愿望。他们不满的是，创造财富和增加自由的改革开放被倒退和封闭所取代，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关系交恶而使中国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个阶层中最聪明的人一定会把习近平的统治视为在经济和社会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表现。那些曾相信可以从极权主义渐进到民主自由的人，必定早已幻想破灭。早在 2000 年，刘军宁就写道：“1989 年的六四事件震惊并唤醒了那些（希望使一党执政更加民主的）知识分子。他们放弃了‘改造不可改造之物’的希望。”他们会赞同赵紫阳的判断，认为今天的中国“无法变得更加进步”。2013 年，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现任《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写道：“一种革命的文化最近重新开始崛起。渐进改革派虽然仍有力量，但正在失去追随者。这种情绪和舆论的转变，源于对长期缺失的自上而下政治改革的失望，以及经济下滑带来的不满情绪。”

当然，党内高官不希望像前总理李克强那样，最后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游泳池里。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和社会动荡的加剧，他们终将会做出判断，他们保护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以及拯救国家的最大希望将是领导革命，而不是徒劳地试图镇压革命。

谁将领导这场革命呢？我三年前出版了《中国改变：自由的大跃进》解释

了为什么极权政权将很快结束，以及可能以何种半虚构的方式结束。我点名领导革命的三个人都已被赶下台，其中一个最终死于游泳池。那么，谁将领导革命呢？目前还没有可以确定的候选领导人。但是，在 1796 年拿破仑·波拿巴对奥地利发动军事行动之前，谁会知道，三年后他会发动政变并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官？在 1916 年，谁又能想到一个体弱多病、郁郁寡欢、悲观厌世的流亡者弗拉基米尔·列宁将在 1917 年领导俄国革命呢？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上台时，谁又能知道，戈尔巴乔夫启动导致共产党和苏联崩溃的改革，而叶利钦将领导向选举民主制和市场经济过渡？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革命形势孕育了革命领袖。中国目前正在形成一种革命形势，它将催生新的领导人，就像 1917 年的俄国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苏联一样。

届时，自由民主国家曾经奉行的接触战略将得到证实。

余：里根总统通过军备竞赛加速了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毁灭，军备竞赛导致苏联将国防开支提高到了足以摧毁其经济的水平。有没有一种对等的策略，能够摧毁中国的极权政权呢？

盖：中国共产党在削弱自己方面确实做得很“出色”，它制造了一些自己也解决不了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它曾让那些不赞同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的私营企业和有产阶层慢慢兴起，现在却把以前的改革开放换成了倒退和闭关。

我们的策略首要任务是善于自我管理，发扬我们自由民主的原则，做出榜样，让中国人看到，在民主制度下他们能过得更好。就像我开头讲的，今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对此至关重要。

从宏观策略来看，自由国家应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在中国推行自由民主：

- 1) 以身作则。我们必须在本国坚持自由民主制度。
- 2) 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它是民主和专制斗争中的敌人。
- 3) 支持和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注意：如果我们不包括用战争这个手段来维护台湾的民主制度，那么上面第 1 条和第 3 条策略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 4) 鼓励中国的年轻人到自由民主国家来寻求教育机会。
- 5) 在国际上维护和推广我们的价值观。
- 6) 反对并揭露中国内部的人权侵犯。
- 7) 对那些直接涉及到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和机构施加制裁。

注意：第 5 条到第 7 条对共产党可能没什么大影响。但我们还是应该这么做，来公开展示我们对我们的价值观的承诺，并支持那些因坚守人权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

- 8) 尽我们所能让中国人明白，我们反对的是极权独裁，而不是中国人民。
- 9) 对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景既不悲观也不自满。

余：那这些宏观策略应该怎么落到实处呢？

盖：1) 选举一位既能在国内坚守民主和法治，在国外也能尊重盟友和伙伴的美国总统。

- 2) 打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 3) 增加我们的国防预算。

- 4) 让美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 5) 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
- 6) 无论如何，都不要把我们最顶尖的技术卖给中国。
- 7) 禁止出口任何能加强中国军力和内部安全服务的技术和商品。
- 8) 通过以下方式严格控制资本市场的准入：
 - a. 对所有中资企业严格执行财务公开规定。
 - b. 禁止对与中国军方和安全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
- 9) 加强防范中国的情报活动，避免造成对我们社会的影响。
- 10) 加大力度防止中国对我们的政客、公务员、媒体和学术界进行渗透和威胁。
- 11) 加强抵御中国干预我们的选举。
- 12) 对文化交流和新闻机构实施对等原则，比如把孔子学院从大学里撤出或者防止中国控制我们的媒体。
- 13) 寻找技术方法打破网络防火墙，让中国人更自由地访问国际信息。
- 14) 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中国银行使用全球银行系统。

未来将为美国及其盟友创造机会，利用我刚指出的强有力的措施打击习近平及其极权独裁政权，并帮助那些希望民主变革的中国人实现愿望。我们必须的心理和制度上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

余：您认为未来最有可能在哪些方面会产生这样的机会？

盖：最可能的途径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就像我之前说的，现在这些地方政府是靠着庞氏骗局勉强维持着。这些骗局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它

们何时结束呢？现在还无法准确判断，但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均到期期限差不多是3年。等这些借贷到期时，地方政府将不得不裁员、停止服务、停止基础设施项目；他们会违约，不再支付给债权人；小银行的储户会损失存款；投资于地方政府融资项目的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会损失资金；依赖地方政府融资的公司会倒闭，失业率会飙升。这样的情况在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比如天津和贵州，已经开始发生了。

中央政府到时候没办法救这些地方政府，因为问题太大了。专家估计，地方债务数额甚至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中央政府也不能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将削弱人民币的价值。

这会带来什么政治后果？这将会引发大规模的愤怒和动荡。我之前说过，那些有产阶级已经对现状感到失望和不满了。安全部门和军队也不会置身事外。他们也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的士气和纪律会被削弱。农村的年轻人会发现，之前很多人通过搬到城市来摆脱贫困的路已经不好走了。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会意识到他们的机会来了。那些一直不满现状，又在等机会的政经精英们，可能会觉得，现在是他们领导一场政变，而不是去压制它，来保护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甚至是救国的大好时机。

中国将面临英国在1831年所面临的选择，当时工业革命催生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要求获得政治代表权：在政治改革和反抗之间做出选择。托马斯·麦考莱敦促议会批准政治改革立法，并警告说：“危险是可怕的且时间紧迫。”如果议会否决这项立法，将会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社会秩序的崩溃。12个月后，该立法获得通过，为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余：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盖：我很高兴有机会与《中国民主季刊》的读者分享我的想法。谢谢！

（此访谈用英文进行，由余浩风译成中文）



黄奕信画作